

1978-1998



北大诗选

臧棣 西渡 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

1978-1998
北大诗选

臧棣 西渡 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诗选/臧棣,西渡编.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5
ISBN 7-5071-0340-4

I. 北… II. ①臧… ②西…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0081 号

北大诗选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发行部电话:(010)68320635 68326644-2372

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5.25

字数:400 千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71-0340-4/I·301

· 定价:20.00 元

序一

百年诗心

谢冕

八十年前爆发的那场新文化运动，北大是风暴的中心。五四运动的一批主将如陈独秀、胡适等，都来自北大。高举《新青年》这面文化革命大旗的，也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北大的教授们。这场文化革命既充满了激情，又是充分务实的。它生发于现实的疼痛感，即由于中国的积弱，而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第一步的工作便是唤醒民众。重铸民魂的目标，使这些先行者倾全力于改革旧文学。这种以文学改革来开发民智的思路，直接继承了清末那些维新变革者的思想遗产。旧文学的营垒中，诗是最顽强的堡垒，这些人意识到，只要诗的变革取得了成功，整个文学变革的胜利亦当在望。新诗的变革就这样被推到了前台。

新诗的创立是中国漫长诗史上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它改变了自古而今中国诗的流向。中国诗从此成为新思维和新情感的载体，而进入自古典向着现代的历史性转移。这个大转移的构思及实现，都浸透了并体现着北大人的智慧和勇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认定北大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发祥地、而且是新诗的摇篮，认定她是中国新诗“摇篮旁的心”，是恰当的和适宜的。

北大的历史从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到今年，是整整一百年。这一百年的历史如弯曲而水流湍急的河道，伴随着历史的忧患和现实的焦虑，给这些莘莘学子留下了沉重的记忆。北大无

疑集中了中国的悲欢与哀乐。但北大是一座学府，它通过自有的方式展示它对中国的关切并作出承诺。北大人的言行总是体现着中国知识者的良知。

作为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北大以知识的探求和积累，以及学理的发明为己任。从这个角度看，它崇尚科学精神，且发出了理性的光辉。在历史的行进中，从这里走出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北大是理性的，但北大又是情感的。在它的不乏沉重感的理性思考中，充溢着激情的辉煌。

由于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人开天辟地的工作，他们造出了新诗草创期的第一个花季。随后，有把抒情诗写得相当精致的冯至，以及当年还是北大学子的“汉园三诗人”，应当说，他们是从北大吸取了灵感，将之化为他们笔下的丽句华章。北大就这样以它的才气和灵智启悟着、也滋润着诗性的光辉。不论是《断章》还是《预言》，还是后来的《十四行集》，它们都登上了中国新诗一个时代的高度。时序推移，即使是在极艰难的年代，草木深深的春城，环绕在闻一多、朱自清、冯至、卞之琳等前辈诗人的周围，在中国西南的上空，那些炫目的新星的光芒，透过简陋的街巷和茅草的屋顶，也闪射着惊人的光焰。

在北大这个摇篮里，新诗诞生了并成长着。北大人以自己的心血创造并滋荣了诗，诗又反过来传达并彰显了北大博大而深邃的情感世界，它的沉思和呐喊。即使是在禁锢和贫乏的年代，北大也没有断了它的动地的歌吟。从红楼和民主广场，从汉花园和西斋，从三角地和大、小膳厅，北大的绵绵诗心总在跳动着。在那难忘的百花时节，北大也有“是时候了”的召唤，也有《人之歌》的思考。即使是那个乍暖还寒的清明时节，当周围弥漫着恐怖的无言，一位年轻的北大女性，在广场放上了一篮洁白的马蹄莲——在那无法表达抗议的年代，它是一

首无言之诗！思想解放的新时代，北大的诗人们以热诚之心拥抱了新诗潮。两卷本《新诗潮诗集》记载着北大人的锐敏与热情。

这是一个充满思想智慧的地方，这又是一个充满诗性激情的地方。北大人在历史行进中，总时不时地爆裂出让世人震惊的奇思异想，也正是那种诗心跳动的外现。社会开放给人们提供了传示诗情更为广阔、也更为自由的空间。但随着滚滚商潮而来的，却有着更为浓郁的世俗情调的包裹。新时代的北大诗人就站立在这样的时空之中。他们带着某种与世不谐的高雅，唱起他们超凡脱俗的歌吟。这里有清澈而神秘的海子，有芬芳而痛苦的麦地，在海子与麦地之间飘然而起的女子，也有着那种超凡脱俗的千种风情。从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后期，北大孕育着、并输送出一批又一批的诗人。这些诗人以自由的心灵、创造的精神，丰富着中国新诗。这诗心虽已百岁，而百岁依然年青！

1998年4月4日于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前夕

序二

一首永远写不完的诗

孙玉石

当北京大学在一片沸沸扬扬的声音中正在走近它的百周年诞辰的时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起生长起来的中国新诗，也经历了整整八十个年头的风风雨雨，迎来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难忘的节日。就在这个时候，或许不是为了凑热闹的“纪念”，或许也不是为了打破一些理论冲撞带来的寂寞感，而单单是出于对诗的热诚，出于对过去和现在校园里的一些热爱诗并写诗的友人们的探索足迹的珍视，出自燕园的诗人臧棣和西渡，要编辑一本北京大学校园诗人的诗选，由中国文学社出版，这本身，就是一个富有历史价值性的举动，因此，当臧棣约我给这本选集写一篇序的时候，我便很高兴地应允了。

八十年前，新诗刚刚诞生的时候，北京大学便成了它的最富有创造生机的摇篮。不仅一批文化革新的先驱者们成了新诗创造的先锋，很多沐浴着科学与民主光辉的正在学习的北京大学的学生，也走进新诗开荒期里“自己的园地”，用坚毅的理性思考和充满朝气与稚嫩的创作，尽了年轻的拓荒者的责任。俞平伯、康白情、傅斯年、罗家伦、冯至、废名……这些名字，将与新诗发展的历史永存。康白情与北京大学的友人以“北社”名义编的1919年《新诗年选》，也作为最早的新诗选本之一，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历史风景。

3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的“汉园三诗人”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又在飘过多少历史风云的红楼内外，在汉花园、太液

池附近的路边、树下，在那些充满温馨与友情的小公寓房间里，共同嚼味着迈向探索新诗现代化之路的“寻梦者”的酸辛和快乐。小小的三人诗选《汉园集》，成为北大“校园诗人”一个殊荣的象征。正在连新诗人也“为这些年轻人杞忧，因而为新诗的前途悲观”的时际，最为理解这批年青的“少数前线诗人”的批评家李健吾，对于他们的先锋精神作了这样充满热诚的肯定：“但是，这群年青人站住了，立稳了，承受以往过去的事业（光荣的创始者，却不就是光荣的创造者），潜心于感觉酝酿和制作。……他们的生命具有火热的情绪，他们的灵魂具有清醒的理智；而想象做成诗的纯粹。他们不求共同，回到各自的内在，谛听人生谐和的旋律。”“通常以为新文学运动，诗的成效不如散文，但在‘现代’一名词而观，散文怕要落后多了。”

40年代，充满了民族的苦难与抗争，光明黑暗的交战与搏斗，由北京大学校园走出来的前辈诗人冯至、卞之琳对新一代青年滋润与启迪，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等西南联大青年诗人群体，面对古今中外的八面来风，在更高的层面上探求着新诗走向世界之路。闻一多的《现代诗钞》，收进了许多与北大有关系的校园诗人的作品。当时有个北大新诗社。它四年的岁月，一半在昆明，一半在北平度过。1948年4月，冯至先生在为这个新诗成立四周年写的一篇短文中，谈到他接触的一些年青的诗人时如是说：“他们新鲜、活泼，因为他们深知他们处在一个既不新鲜也不活泼的社会里。由此他们也更深一层意识到时代所给予他们的幸福与苦难。他们的作品使前一辈的诗人回顾自己走过的狭窄的道路而感到惭愧，他们的声音使一些自居为青年导师的人们失去‘尊严’，这中间不是隐隐地孕育着一个新趋势、新的发展吗？”

然而在此后的近三十多年里，这条“正道”留下的却是火热而苍白的悲凉记忆。

80年代,运行的地火在新生的青春中迸发。恢复理智的也恢复了奔涌的诗情。与民族的和世界的悠长和崭新传统的联结,融进了无数创造者的渴望,一群更加充满冷峻与热诚,更加富有民族人文与艺术关切的“校园诗人”,构成了更为宏大的“探险队”。他们二十年的创作结晶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六十年的成果。不少诗人已经由燕园走向社会,走进更广大的读者,走进了关注中国新诗的现在与未来的世界的眼睛……

历史已经证明,从校园走向社会,又从社会以丰富的精神资源反馈于校园;从稚气走向成熟,又从成熟的创造之光照亮校园诗思的青春,这个无限循环的探索之路,是中国新诗生命中一条永无止息的艺术“正道”。校园永远是中国诗人的“黄埔”。校园诗人送给人们的是对于“新鲜,活泼”的惊喜。他们有开放的眼光和吸吮一切营养的广阔襟怀。他们有甘于寂寞的沉潜意识和追求自己个性风格的冷静品格。个人化写作的姿态中潜流着对于时代和生活的大关注和大忠诚。他们以自己充满灵性的心灵与眼睛,以流着青春之光的血与无数不眠之夜的苦思写下的诗篇,确然隐隐地孕育着,展示着一种“新的趋势、新的发展”前景的信息。它带给我的天空是一道凝定的彩虹。我永远坚守对于一片灿烂风景的期许、信念和等待。

我多年里接触过不少喜欢诗的学生。他们写诗,他们也给我读他们的作品。我也读过我并没教过的很多北大青年诗人的创作。面对他们的作品我常常陷入茫然无知的尴尬。我不知怎样进入他们的世界。我自然看到不少故作艰深的幼稚,但也看到许多富有才气的灵性。我看到不少艺术摸索中的混乱和臆语,看到了一些自命不凡的啸傲与狂狷,但更多看到并令我引以自慰的还是:年青探求者们的真诚,的沉着,的坚韧,的执著,和他们百折不回的清醒。骆一禾,海子,西川,戈麦,臧棣,清平,恒平,麦芒,西渡……一连串的名字对于诗国已不再

陌生。他们提供的创造是多样个性与才情的显示。有的经过岁月的风霜的磨炼,已经烙进历史的记忆;有的如刚刚破土而挺立于大野的稚树,向广阔的天宇展示他们的一角新绿和含苞待放的希望。他们已经馈赠给广大读者的诸多个人诗集,他们的这个群体创造结晶选本的出生,更给我一种冷静和耐心:无须急躁,不必苛责,更不要以长者或权威的姿态向他们发出训斥的声音。新诗在20年代到40年代的三十年里,产生了许多属于闪耀这个世纪光辉的精品,出现了艾青、穆旦、冯至这样的世界性的大诗人;从70年代末到现在只有二十年的时间,我们今天诗的创造者们与过去相比又拥有更大的艺术资源和精神空间,我相信我的和更多人的期待收获的不会永远是一座“将来之花园”。

“校园诗人”在今天是一个并不怎么令人乐于接受的符号。这些诗人的成长与前行,主要靠的是他们自身的天分、才情与悟性,靠他们广博的吸收,质素的提高,与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创造。同校园中如鲁迅先生说的什么“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的“教诲”关系甚微:“你们多的是生力,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华盖集·导师》)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杨晦先生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句忠告,是一个有某种真理性的预言。但从从不培养作家和诗人的地方永远地走出一些作家和诗人,这却又是一个历史的实在。

“校园诗人”的幸福在于这里有一片永在的沃土。这沃土就是喜爱诗并理解诗的连绵不断的一代又一代的青春,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精神空间和生活氛围,是一种永远给予的支撑人生向上攀登的力量。我尊敬的老师、30年代清华大学“校园诗人”林庚先生,于1990年给我的一幅题字中写了这样一句

话：“人生的提纯，诗人因此也是一场修行”。我相信从这个校园里出来的诗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将会于自己一生的漫长“修行”中永不忘记这片“热土”。

在教学中，在课堂内外，我讲过许多许多次新诗的历史与现在，美的探求与沉思，创造的不满和期待，奥秘的破解和纷争，艺术享受的快乐和失败的臧否……由此我从学生的共鸣和理解中得到的快乐，得到的理论启迪，将是我终生的精神拥有。我尝味过做泥土里一粒砂石的点滴的快乐。

记得我在第一教学楼最大的教室的一次关于诗歌的讲座。那是在一个宁静的夏天的夜晚。所有座位挤满了听讲的学生。有不少同学站着直到听完。众多的眼睛里流着渴望的光亮。现代诗作深藏的美流进了他们的心里。讲课中间，坐在前排的同学递上从后面传来的一张纸条。这是折叠成长条的一整张印有“北京大学”四个红字的信纸。上面仅仅写了这样两行圆珠笔字：

孙老师：

请您坐着讲课吧，或是休息一会儿，

杯子里有热茶。

我至今不知道也无需知道写这个纸条的人的名字。我忘记了当时我的眼里湿润着的是泪水还是汗水。十几年来我一直将这张发黄了的纸条压在我的玻璃板底下。面对褪了色的带有几分稚气的字迹，我总感到我珍存的不只是一颗热爱诗的年青的心的跃动，不只是燕园两代学子之间滚烫的心与心的交流，也不只是并非“校园诗人”写下的一句无声的真纯……我珍存的是一首永远写不完的诗！

为一首永远写不完的诗，我拉扯了这些话，算做序言。

1998年4月8日于畅春园

序三

我和“北大诗人”们

洪子诚

说起来，我和近二十年的北大诗歌，算是有一点关系，因此，本诗选的编者才会想起让我来写这样的文字。1977年，教研室筹划编写“当代文学”的教材，诗歌部分本应由谢冕先生来承担。但谢先生没有答应，这件事就落到我头上。既然写了教材的诗歌部分，接着上课也理所当然地讲诗。后来又开设“近年诗歌评选”和“当代诗歌研究”的选修课，且多次被谢先生拉去参加他们主持的“新诗导读”、“当代新诗群落研究”的讨论课，这样，在有的学生的想象中，我便是和诗歌有“关系”的人了——虽然我不只一次地澄清这种误解，指出我对于诗确实还未真正入门，那也没有用。

于是，便不断收到各种自己编印的诗集、刊物。如坚持多年的诗刊《启明星》，如《江烽诗选》，《未名湖诗集》，如四人诗歌合集《大雨》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是出版于1985年的《新诗潮诗集》了，当然，收入的大都不是北大诗人的作品。五四文学社和另外的一些诗歌社团，也曾让我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如一年一度的未名湖诗歌朗诵会（但大多我都没有参加）。我读着他们写的诗，但不系统。在这些诗面前，有过惊异，欣喜，也有过怀疑和困惑。但因为对自己的感觉和判断力缺乏信心，很少当面谈过对他们的诗的看法。有的诗读不懂，不知所云，碍于“师道尊严”的思想障碍，也未能做到“不耻下问”。

这二十年中在北大写诗的“风云人物”，名字我大多知道，

但人却不一定见过。而且,和见过面的北大诗人谈论诗的时间,这二十年中加在一起,不会超过四十分钟。我从未见过海子。西川是他毕业离校后很久,才知道他的长相的(有一次臧棣和他来到我的住处)。老木的见面是课后在“三教”的门口。他拦住我,兴奋地说他发现一个比北岛还棒的诗人(我猜他是指多多,后来的《新诗潮诗集》选了多多不少诗)。我认识蔡恒平时,他已在读当代文学的研究生。有一个学期,他和吴晓东跑来参加当代研究生的讨论课,并做了“当代文学与宗教”的专题发言,对顾城诗的“宗教感”推崇备至。1993年顾城事件发生后,我不只一次想到这次发言,觉得如果蔡(这是他的同学对他的称呼)为此事受到打击的话,顾城至少要对此负责。王清平的毕业论文是我“指导”的,因此见过几次面。熏黄了的手指,可以见出他的烟瘾。文稿的字迹潦草得颇难辨识,每个字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佝偻病般地歪向一边。但对于“朦胧诗”退潮之后的诗歌现象的描述,却令我当时兴奋不已。我将这篇两万多字的论文编进“新时期诗歌”研究的集子,列入某著名批评家主编的丛书之中。在拖了数年之后,这套书连同王清平的清丽流畅的文字一并“夭折”:想起来真觉得对他不起。褚福军也因为诗找过我。1989年夏天他毕业离校后,还几次到过我家;但却是与诗毫无关系的事情。他去世后,才知道他是戈麦,收到西渡编选的《戈麦诗选》。1983年3、4月间,一次课间休息,一个男生对我说,他叫骆一禾,毕业论文想让我“指导”,是写北岛的。问他为什么不报考研究生,他露出调皮却优雅的笑容:“水平不够,不敢。”过了几个星期,稿子便在教室里交给我。在龙飞凤舞(或幼稚笨拙)成为当代青年书法时尚的当时,看到这整齐、清秀,自始至终一丝不苟的字体,叫我难以置信。长达三万多字的论文,上篇阐述他对于诗的看法,下篇分析北岛的创作。在我看来,研究北岛的文字,这一篇至今仍

是最出色的。我期待着它的公开发表，却总是没有见到。最后一次见到骆一禾，是在80年代就要结束的那一年。那天，我和谢冕默默地站在蔚秀园门口，街上没有什么人。不久，从西校门里走出来三位学生，两男一女，女的手中捧着鲜花一束。在询问了我们的去向，不再说话，也默默地站在我们旁边。一辆中巴把我们送到八宝山。来向骆一禾告别的人并不很多，但肯定都是觉得必须来的。他的脸上没有了那孩子气然而优雅的笑容，因此我感到陌生。在他的周围，没有惯常的那种花圈、挽联、哀乐。一长幅的白布，挂着他的亲属、他的朋友写的小纸片、布片和手工的纪念品，上面写着或温情、或悲哀的语句和诗行。当这些被取下来准备与他一起焚化时，臧棣从裤兜里掏出一小块白布，展开抚平了折痕，也放在上面。这是毛笔画的正在飞翔的鸽子，旁边写的诗句，却没有能记住。西川和其他人拉着灵床走向火化室——但那时我不认识西川，最后这个细节，是后来读了他的文章才知道的。那篇文章称骆一禾是“深渊里的翱翔者”。看来，画鸽子的臧棣和拉灵床的西川对于骆一禾的精神的描述，是这样地不约而同。那一天是1989年6月10日。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车辆，也没有多少行人。一个上千万人口的都市如此寂静，使人感到害怕。这种异样在记忆里，很长时间都难以离去。

上面讲的是有关北大诗人以为我和诗有关系的“误解”。下面要讲的却是我对这些诗人的“误解”。这方面的事例甚多，这里只举几则。

有一个时期，麦芒蓄着长发，大概是他当谢先生的博士生的时候。我对男人留长发有一种天生的反感，并总容易做出与“行为不检”（至少是“自由散漫”）等有关的联想。后来的事实雄辩地证明，我的这种守旧毫无道理，头发的长度并不一定与学问为人成反比，麦芒不说是品学兼优罢，行为举止至少也未

发现任何不轨的征象。

前边讲到指导学生的论文，两次给指导一词加上引号。这是因为我确实没有指导过他们：没有讨论过提纲，没有再三再四的修改，送来的稿子几乎就是定稿。这使我做出一种判断，“诗人”们在“学问”上，也是可以信赖的，而且总是相当出色。因此，如果有“诗人”要我“指导”论文，我总是欣然应允。但后来发觉，任何绝对化的判断，都经不起事实的验证。也会有“诗人”的论文，让我十分头疼的时候。

北大诗人除了极个别的外，都会起一个甚至数个笔名。笔名大多是两个字的，如西塞、西川、西渡、紫地、海子、戈麦（松夏）、麦芒、橡子、海翁、徐永、阿吾等等。这些眼花缭乱的名字，常让我伤脑筋。学生名册和记本上自然找不到这些名字，而要记住郁文就是姚献民，西渡就是陈国平，松夏就是戈麦就是褚福军，野渡就是麦芒就是黄亦兵，还得下点功夫。不过，在牢记了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之后，倒觉得这些名字有着一种亲切。于是便想，诗名和诗情可能存在互动的效应。如果西川不叫西川而叫刘军，他会写出那样的诗吗？我至今还未发现有取芯片、干红干白、大盘绩优股之类作为诗名的，说明土地、河海、树木仍是北大诗人想象的源泉，大自然仍是他们心目中的“精神栖息地”。

诗歌朗诵会是北大诗歌活动的重要项目之一，但我却很少参加。部分原因，是在很久以前（那时，未名湖诗会还未诞生）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因为位子太靠近台前，朗诵者那种经过训练的、夸张的表情、姿势和声调，看（听）得十分真切，使我很不舒服。有的诗，曾是你所喜欢的；经过这样的矫情处理，会增加再次面对它的困难。但是，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听到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欧阳江河（《玻璃工厂》）、西川（《致敬》）的朗诵之后，又发现我的看法没有根据。语调、节奏，有了

声音的词语,将会“复活”在默读时没有发觉的那部分生命;如果朗诵者能把这种“生命”注入词语之中的话。

80年代是个各种潮流涌动的时代,诗歌在这方面尤其突出。在我最初的印象里,北大的诗人们也是一群弄潮儿,也是根据浪潮方向来做出艺术判断的。这种印象,不久就觉得不怎么正确。呼应与推动潮流自然是有的,也有必要,但也存在一种沉稳的素质,一种审察的、批判的态度。当大陆这边和海峡那边有的前辈诗人,以过来者的身份,批评他们的观念和写作过于“先锋”时,他们曾和这些前辈诗人发生过小小的冲突。而在把中国当代诗的创造折合为“谁是真正现代派”——这种诗歌意识兴盛的时候,他们中有人指出,这是“中国诗学和批评出现了判断力上的毛病:看不清创造”。同样,80年代风行一时的“反文化”的潮流,好像并不太为北大诗人所接纳。他们也许并不轻忽“语言意识”,但却坚持有着“精神地看待语言和只是物质地看待语言”的高下之分。

对于北大诗人的诗,我读得不很系统。原因在于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校园诗歌”是一种习作性质的诗。这个判断所包含的意思还有,它们是狭隘的,缺乏“深厚”的生活体验的,“学生腔”的,摹仿性的等等。这种观念主要形成于五六十年代,那时,诗据说只能生产于车间、地头 and 兵营。因此,在编写教材和“当代诗史”时,我“系统”地读过50年代到80年代许多诗人的值得读、或不值得读的诗集,却没有“系统”地读这些被称为“校园诗人”的诗,其中有不少是值得读的。这种“判断力上的毛病”,我已觉察到。不需援引汉园三诗人的例子,不需援引西南联大诗人的例子,也不需援引台湾现代诗写作者的例子。就在这册诗选中,也能看到80年代以来大学诗歌写作实绩的一个侧面。别的什么理由都暂且放在一边。在今天,坚持诗的精神高度和语言潜力发掘的写作者,仅靠一点才气,

一点小聪明，一点青年人的热情和锐敏感觉，是远远不够的。我很赞同这样的意见，“一个诗人，一个作家，甚至一个批评家，应该具备与其雄心或欲望或使命感相对称的文化背景和精神深度，他应该对世界文化的脉络有一个基本了解，对自身的文化处境有一个基本判断”。这话说自一个“北大诗人”之口，通往这一目标自然有多条途径，而大学的背景，肯定不是达到这一要求的障碍。在今日，有的诗人创作的狭隘和停滞不前，恰恰是发生在文化背景和精神深度的欠缺上。

1998年4月6日于北大燕北园